

# 經濟學說史

第三冊

北京大學經濟學  
1959年11月

# 第十八章

十九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批判

## (一) 新历史学派

概论。1870—1871 以普鲁士的胜利告终的看法战事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帝国，完成了1871年初年，俾斯麦会议以后，德意志民族统一帝国形式的历史任务，但是这一个统一了德意志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完全统治的国家而是一个「下」，用议会形式掩饰起来的，和封建残余混合在一起的，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的，官僚主义地主阶级的，用警察保护着的军事专制」(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解放社版，26—27页)的国家。

十九世纪中叶后，德国的工业，交通，海运都有很大的发展。1870—1871年法国的法国战事借款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飞跃高涨。到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到了它的顶峰，真正的大工业，真正的近代资产阶级」也及至「有」真正的经济恐慌，有了真正广大的无产阶级。」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新者)优越地位，他方面由于英国运动失败的将性，和法国运动受镇压的压制，德国工人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队」(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卷，第10页)。

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一国际的活动，引起资产阶级恐慌。马克思资本论出版给与工人运动以有力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在思想战线上，德国无产阶级受到严重的威胁。

科專的任務。  
上述各派，以總地說，均係經濟學派。而與馬克思主義作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是以歷史學派佔統治地位為其特徵。而此  
學派既若為德國經濟學的時間很长——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年。但它可  
以分為兩丁段也，即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即歷史學派盛行於四五六十年代，而在七十年代之  
后，新歷史學派就作為它的代表者。而新歷史學派在若干方面——主要是在方法論上——有  
其共同點。即因時代歷史環境不同，它們的主要任務也不一樣。即歷史學派主要是抨擊英國  
古典學派和空想社會主義。新歷史學派，雖然繼承和繼續回派對於古典學派的攻擊，實際上，  
是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為其主要任務。

新歷史學派曾以伯德赫 艾莫勒 (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 為其代表者。他們的主要著作  
「國民經濟學大綱」(1893-1904) 是新歷史派的代表作。此外還有貝德赫 (E. Biedermann)、  
和布希 (K. Buchner)、羅堡 (Schorberg) 等。艾莫勒 (A. Mayer) 是這一派的中堅  
人物。

主張歷史歸納方法，反對經濟規律，在反對抽象演繹方法，主張歷史歸納方法一面上，  
則與歷史學派和舊歷史學派基本一致。但是新歷史學派認為它們和舊歷史學派，在方法論上，  
還有差異。艾莫勒就認為「新歷史學派和羅堡的差異在於他們比較的不急于普遍化，而  
感覺必須從事實物廣泛蒐集而進行研究。時代，民族及經濟狀態的特別研究」(艾莫勒，經濟  
學大綱，第二〇頁)。在艾莫勒指導下，新歷史學派曾從事大量史料蒐集的准备工作。在十

九世纪末年他们出版了许多关于某些国家（主要是德国）过去经济制度，经济生活详细的叙述性的专著。他们虽然声称他们企图以这样的归纳方法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但在研究整理其的庞大的历史资料中，他们并没有归纳出任何经济理论体系。

新历史学派又以为他们的历史方法和旧派迥异。他们说旧历史学派的方法是「历史比较方法」而他们的则是「历史统计方法」。他们企图以数量表达方式来说明他们的方法更为科学。实际上，二者之间只是一字之差的区别。在本质上，他们都是根本取消经济学的理论，把经济学变成某些特殊经济问题的叙述。历史学派的方法，无论是所谓「历史统计方法」或者是「历史生理方法」，都只限于及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能深入分析现象自身内部的联系和本质。

立宪制方是历史学理论的一方法，而新派的方法，充既非科学理论历史方法，也非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理论是科学理论，而历史学理论是科学理论，而历史学理论是科学理论。理论和实践以历史学者的根据但又决不足为历史的形式和历史偶然性的解释而是历史事件的内在发展运动的表现。因此理论和历史是一致的，以史学为新的新历史学派不但在历史学，也根本取消了理论。

新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既否定了历史学的一般理论也就否定了经济规律，比起旧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更强调国民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更根本地排斥任何经济一般规律的建立。斯大林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社会资料的生产和社会分配的科学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六四页）发现，以只谈些规律，就是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门科学，的任务，新历史学派是认为社会科学就是决定政治经济之成为一门科学。

新旧历史学派一样，新历史学派否认经济规律是企图否定古典学派的揭露出来的，私有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阶级对立，剥削关系，为资产阶级作辩护，但新历史学派比旧历史学派更进一阶，更有意识地以否定经济规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德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故乡，十九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新历史学派否认经济规律与其说是针对着古典派的自由主义，无宁说针对着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以否认规律来掩盖马克思主义主要的论证，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分析，所作出的种种理论总结，最基础是他们断言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发展理想，因此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有某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因此，在德国，就只是可以有“德国社会主义”。他们的这种迂曲和虚伪与葛路德为法西斯匪帮所利用。

改组主义的“社会政策”，“德国社会政策协会”。新历史学派企图以改组主义的“社会政策”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国家干涉的方法，采取一定的，所谓劳资冲突的社会政策，以解决当时在德国，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日、尔、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德国社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敌人。

他们的社会改良政策是以经济学的伦理观道德观为掩护的，他们狂热反对古典派“利己”说，认为除了“利己”之外，还有其他的动机足以影响人类经济生活，他们把经济学看成是伦理学的科学，史莫勒固然他们自己为“历史的伦理学派”。

他们强调「伦理趋向」以掩盖阶级矛盾的本质，认为阶级矛盾只是人们尚道德的问题。因此，问题的解决不需要阶级斗争，更不需要革命，而是应该根据道德伦理观念，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措施，以达到改善和解决。「伦理趋向」只是他们企图欺瞒工人和资产阶级服务的办法。

在否定规律强调伦理的基础上，他们提出改良主义社会政策的主张，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八七五年他们创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参加者除了他们外还有各政党的代表以及若干大资本家。他们利用这个协会，把自已的活动扩展到了实际政治领域。通过这个协会新历史派充当了完成德国统一的俾斯麦强有力的羽翼，变成执行这的强力政权社会政策的咨询机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心。艾莫勒，在爱森纳赫第一次会议上所发表的关于创立目的讲演，公开地，露骨地，暴露出来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蔑视和这一组织极端反动的企图和本质。

他们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但当时的德国的自由经济主义者，嘲笑他，称他们为「社会社会主义」的附庸。他们却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他们企图冒用社会主义牌子，而实际上，以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以掩盖德国工人阶级。

「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分为两翼，以艾莫勒为首的右翼，强调彻底地由国家来执行改良社会政策，即自上而下的改良。以希勒坦为首的左翼，则主张依靠劳动组织以推动社会改良。艾莫勒的主张为俾斯麦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德国的社会立法，公共国有化等及其他欧洲国家之上。但是俾斯麦坦白地承认这些措施主要的目的只是消除

正主义的的思想来流是布勒坦德和森巴特。

布勒坦德又只提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人孙恩替他第一人。他颂扬帝国主义的卡特尔组织，说它可以缓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达到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经济计划化。列（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解放社版，第三十六页。布勒坦德还论说卡特尔可使工人状况日益改善，因为卡特尔保证了商品的销路，因而免除了失业，他诬蔑地说工人是拥护卡特尔拥护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但是事实驳斥了他的谎言。在英斯朋及下（才教十二页）。

右翼也好，左翼也好，新历史学派全部经济学说反映着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情況，及映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赶上了西欧先进国家之后，和它们一同向着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期的要求。他们的学说为德国容克阶级，社会民主党中央机会主义者，为二十世纪初所谓德国学派，以及以后法西斯分子所接受和广泛的利用。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学说的反动本质。

二、奥国学派。

概论。奥国学派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学派。因为这个学

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Karl Menger 1800-1921) 死巴德克 (Engel von Bokum-Brauer 1851-1914) 和维也 (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6) 都居住在意大利，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奥国学派。奥国学派也有时被称为维也纳学派，和心理学派。

奥国学派，和新历史学派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形成于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延续于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九年。在十九世纪末三十年，意大利经济发达的情况和德国相类似，他的资本主义工业也是，在这一时期，才进行与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的坚决的斗争以完成工业革命，虽然奥国的工业的发展速度比德国低得多。

但是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整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趋势，和阶级斗争，在实际行动和思想意识上更加尖锐的情形，在奥国，也得到了剧烈的反应。「资本论」的出版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资产阶级起初想用「限制限制」的办法来对付工人运动，但是「资本论」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影响的广泛，扩大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限制限制」的失败，而迫切向其思想著作社会定货企业反叛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新历史学派是这企图一种。奥国学派是这企图的另一种。新历史学派承认旧历史学派庸俗的「历史主义」，否定抽象演绎方法，完全摒弃理论。奥国学派一方面在方法问题上，反对历史学派，主张利用抽象演绎法来重新恢复理论。另一方面，在理论内容问题上，他又表面标榜与古典派相对立，古典派的劳动价值说，而代之以从欲望出发，以效用为中心的生理价值论。在这两个对立基础上，奥国学派建立他们的新理论体系。他们的理论体系，自第一步起，就企图，在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斗争中，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



义的价值论，为资产阶级服务，不同于新历史学派，他们没有针对经济现实的具体经济政策  
和主张。他们是在此种的理论上，和马克思主义斗争。

虽然在拿破仑时期，这一派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但他们的思想和作用  
却带有国际性。

所谓效用价值说在十八世纪法国的康狄拉克 (S. D. de Condillac) 和意大利的里利  
(Verré) 著作中已露其端，而做效用价值学说，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葛德 (H. Hermann

Stosser) 的著作中就具有完备的姿态。但是这些先驱者并没有创立新学派。葛德的著作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发观之前，是一本没有被注意的书。奥国学派在七十年代以后才成立是  
有它的社会需求。

七十年代中，除了奥国学派第一个代表门塔涅也纳只定了新派的基础的同外，英国的  
哲文斯 (W. S. Jevons) 和瑞士的利昂·瓦拉斯 (Leon Walras) 也各自独立地构成其  
价值理论。但是，在英国，哲文斯没有有力的追随者和发展者，而侧重于数学方法的瓦拉斯  
则向着和奥国学派，多少不同方法的发展，构成了后来主观学派的数理学派。以他也纳  
为中心的学派，因为有了厄巴德克和维也特的继续，乃形成一个大流派，在消费分析的  
基础上，建立心理学派的主观主义「理论」。

奥国学派的影响，在第一世界大战后已经衰歇，但其观点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还是在流行，  
「边际效用」概念，至今日还是资产阶级庸俗改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如门塔涅的「抽象演绎法」。奥国学派反对历史学派所主张的历史归纳法，而又张以抽象

演绎法至新恢复理论研究，建立理论体系，奥国学派，对于历史派的开始于奥国学派首创人门格和新历史学派领袖史莫勃的激烈论战。门格的意见可以，一般地，代表奥国学派，对于方法论的意见。

门格说，在整理论论领域，有两种研究方法，一为现实的，经验的方法，一为严密的方法。他认为理论科学的任务是在提供经验直接经验以上的，一般类型和类型关系的认识，因此，他排斥前一方法而主张后一方法。

所谓严密的方法，依据门格的意见，乃是要求一切要素的，最简单的要素，把这些要素从其他一切的影响孤立起来而阐明其相互关系，这些要素是第一是欲望，第二是自然提供给人类的财富，第三是在可能范围内，想完全满足欲望的努力。奥国学派从研究对象上，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就指出社会的一定形态，从门格就所说的三个简单要素，他把经济学的对象理解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在满足欲望的努力上，所显示出来，与生产要素毫不相类的人类的心理已心的表现。

不仅如此，奥国学派是以极端的人文主义为其研究方法的而提。门格和其他奥国学派经济学家企图从孤立的个人经济来解释他们社会要素之间的现象，他们认为在孤立的个人经济——所谓经济——中，有国民经济的范围，在个人和财富关系的心理分析中，存在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的疑。他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和其他人具有社会关系的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而是孤立的，不属于社会的「原子」。所以门格，为说明他的见解，所挑选的例子

是「原始森林的住民」，以淡中微弱的存在者，「荒原上」一个无足见的人」，「一个孤独的农人」等。他们把社会看为这些「原子」个人的集合体，把社会经济看为这些个人经济的机械总计。我荒谬的是这些人是从一切社会而断了的孤立生活的人。

他们自命为用的是抽象方法，但是他们的抽象方法不但与非科学的抽象方法截然不同就是与他们所自命为迷的古典学派的的方法也不一样。科学的抽象不能不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抽象，不能不是从有社会关系的特定「社会」中所抽象。和一切社会关系而断了的，孤立生活的曹真孙只是理想的构成物。在现实生活中，各个人的经济活动，都必然以一定社会环境，个人经济的社会关系为前提。作为现实社会一个成员的与人，在其行动中需要使自已适应于社会现象的一定形态，社会的现象影响了他与人的动机，当然，在人类社会，个人的动机有它的「反作用」；但些些动机一开始便被浸透了社会的内容。所以孤立生活的与人动机是不能身引其在社会规律的，而其因果派恰是要从孤立生活的曹真孙的欲望和其评价中身引经济规律来。在他们狂热地孤立生活的曹真孙的行动时，一夫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子却看不见了，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论证经济规律不依存于社会生活，经济规律不是从社会引伸出来，而是从人引伸出来。人世是永恒的，所以经济规律也是永恒的从而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永恒的。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前提不但在方法上是反科学的，在本质上，也是反动的。

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抽象方法也是以人为出发点。斯密等加图也常以单独的猎人和渔夫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但是成为斯密，马加图五文的单独的猎人和渔夫是导引到十八世纪的

一种时代的错觉。在十八世纪，这种冒充预言式的人的错觉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十八世纪的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态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在十八世纪预言者们——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来，似乎是一种理想，其存在属于过去，；因为恩他们对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于自然的人就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自然赋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第51页）。对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冒充林式的个人就进时代错觉都不足了，况且十九世纪的个人还是生产的人，还是被「作为商品所有者，使其依据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来交换他和野兽」（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卷一，第五九页）。而政治经济学的个人乃是另消费的个个人。

英国学派这种史料学的抽象法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观矣，也就必然地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他们批评历史学派取消理论而考据历史，而他们却是高谈「理论」而完全抹杀历史。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严密地强调经济理论的历史性和共诸规律的相对性，资本主义的研究必须注意所以它射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历史的，典型的特点。忽略了这些特征，我们就达到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一般范畴上去，而因此不能说明近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所规定的特别发展过程。忘记了这根本原理的能力，马克思说「正是想证明，现存生产关系永恒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所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解放社版，第一四九页）。

边缘上主观价值论，价值论是奥国学派经济理论的中心。实际上，它不但不是他们的理论的中心，而且是体现他们全部的理论体系，贯穿在他们的全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他们的价值是所谓边缘效用价值论，而边缘效用文足以欲望为出发点，奥国学派价值论是以边缘效用价值论为目标。

亚当·斯密地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以后者为经济学所取，后来的经济学家也常以斯密的分类为出发点。庞巴维克摒弃了这个分类法，把价值分为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是消费者对于财富所能的主观评价，客观价值则是属于于财富本身的效能，他认为经济学的作用就是主观价值不是客观价值，因为财富本身的效能，如食物的营养，煤的发热，没有共同的经济意义。但是他又认为客观价值已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有一定的共同意义。庞巴维克说客观交换价值是在交换中，当作异质，而获得一定数量其他同质的能力。庞巴维克客观交换价值的概念是荒谬的，他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当作一种客观的能力与营养，发热等性能并列。他混淆交换价值这个经济概念和商品的物理或化学的性能。

问题还不只此，庞巴维克的客观交换价值还是派生的东西。因为根据奥国学派的说法，商品所能换取一定数量其他商品的能力恰，不是一种依赖于商品本身的物理属性而是依赖于人们对于此商品的评价，换言之，他所谓客观交换价值是主观评价的产物，为此，则无异取消了客观交换价值之为客观的东西，客观交换价值也变成了主观的东西。

奥国既然把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他们就宣称效用是价值的源泉，在马克思价值论里，效用不过是价值成立的条件，不影响价值。然而在奥国学派价值论里，价值成为效用的直接

表现。

奥国学派的根本谬误是在于把价值与效用混同。效用价值与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效用价值为首价值，从而掩盖了价值所包含的社会关系。但是只指出这一点还不够。因而奥国学派的价值观不只是效用论而是「边际效用」论。他们认为有创造性的新说是在效用基础上加上所谓「边际概念」。他们以为效用只说明价值的源泉，而「边际效用」便确定了价值的高低大小。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揭露这个「边际效用」概念的复杂本质。

奥国学派认为效用是商品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一种商品能满足多种重要性的欲望，例如水可以满足饮用、沐浴、洗花等欲望。而在某一种欲望中随着这种欲望的满足，商品的次要性又逐步减小。例如当多饮水的欲望已得到第一杯水满足之后，第二杯水的次要性也就逐步减小。

在这基础上，奥国学派认为每一个人在利用一种财富来满足不同欲望时，首先要满足最重要的欲望，再满足次要的欲望，再满足更次要的欲望，以此类推。如果这种财富的数量是有限的，则在这一系列被满足的欲望中，最后被满足的某一种欲望，就是最不重要的欲望，也就是他们所谓「边际欲望」。如果财富数量减小，它是首先被去掉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边际效用」，他们说，就是这一商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边际效用」不但决定满足这一「边际欲望」的财富单位的价值，并且决定这一财富其他单位的价值。换言之，决定某一财富单位的不是该财富所能产生的最大效用，或平均效用，而是最小效用。

奥国学派的理论是互相矛盾的。首先是心理因素如何可以表现为经济衡量的问题，奥国学

决定把贮存于仓库的货物的数量，从而把它的效用当作一定数量的大小来计算的，然而欲望，效用却是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因素如何作为一定数量来测定？奥国学派并没有说明这一点，而且只是说明了具体欲望，在心理反应上有强弱程度的不同，但是这种强弱程度不能决定其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数量。而价值所要求的恰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数量。

其次奥国学派，在论价值决定因素时，也谈效用。但总是说以一定量的财货，这一定量财货从何而来；它本身的数量又由什么所规定呢？奥国学派只是把这一定量作为既定的存在。这观点是深远的。政治经济学家所分析的包括一切经济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一定量的财货的存在必须以生产过程为前提。奥国学派抹杀了生产过程，以一定量再货做定论，是企图否认财货的稀缺性（在绝大多数场合）是一定生产过程的必然表现，社会劳动支出的函数。奥国学派总喜欢举水和空气作例子。水和空气是天然赋于的东西，没有生产过程，他们利用这个例子以逃避生产过程的问题，但是今天社会中心要的价格问题是有生产过程的。商品的价值问题，他们从水和空气偷渡到这类型的产品，认为它们可以并列齐观。他们的企图，实际上，是以抹杀生产过程的方法来割断价值与劳动的任何联系，以及对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

在奥国学派的效用论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问题上，奥国学派提出了更谬误的论证。

奥国学派把财货分为二类——消费财货，生产财货。后者包括生产资料 and 劳动。由此可见，劳动不被看作活动的创造过程而是被看作许多财货中的一种。他在把生产资料 and 劳动混为一谈后，使用「边际效用」来说明生产资料（生产财货）的价值。

奥国学派认为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由它所制造出来产品的价值所决定。换言之，生产资料

的价值不是由于它本身的「边际效用」所直接决定（因为它不是直接消费品），而是由于它的产品的边际效用所间接决定。铜的价值是由铜器的价值，即铜器的「边际效用」所间接而来的。奥国学派是这样的把「边际效用」「理论」从消费资料引伸到生产资料，以达到他们所谓「交换」的平等性。

奥国学派这个「理论」是完全违反实际的。我们知道价值的传达是相反的，恰是从生产物的过盛。在币价里，如果铜的生产率提高了，铜价就要下跌，而铜器价格的下跌总止原料价格下跌之后。

奥国学派这个「理论」，在逻辑上，还陷于循环推理的错误。照他们的意见，生产资料的价值被产品的价值所决定，产品的价值被产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而产品「边际效用」的高低又与产品的量成反比例。于是问题发生了，产品的量又按什么决定呢？在他们以孤立的眼光从式子人经济看出发点时，他们不敢考虑这个问题而只是假定一个变量「存在」的存在。但是他们不敢永远逃避这个问题。在他们不敢不接触到现实市场情况时，这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把生产费用的概念偷「地引进来」了。例如厄巴维克就讲「……在市场中所能处分的商品的数量又在广泛的范围内被生产费的高低所决定。即一商品的生产费愈高，生产所获得的单位数量相对地愈减」（厄巴维克，经济概论，第三二页）。这就等于说生产资料的价值，被产品的价值所决定，而产品的价值，又通过市场的供给量，被生产资料的价

值所决定。  
厄巴维克「附」利息论。



英國學派價值論是他們利潤學說的前提。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剩餘價值理論，揭發了資本主義社會利潤的剝削本質。英國學派企圖在體系價值之為歷史範疇的基礎上，把利潤變為主觀的、心理的，因而是永恆的範疇，以反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以否認利潤的剝削本質。

英國學派的代表們對於利潤的解釋不完全一致。內格，維也納把利潤曲解為資本參加產品生產的報酬。而庇巴維克的「理論」是建立在主觀價值論和時間要素的結合上的。但是在庇巴維克所自造的「剝削理論」發表之後，它便為其他英國學派經濟學家所接受而成為英國學派的相調理論。

庇巴維克認為利潤必要或真正以為「科學」的「假說」便立刻為地獄與生產和勞動一切概念的互相脫離。他認為時間對於價值的影响是利潤學說的「理論」的核。他在他的「資本」正論「一」書中發揮了他這「理論」。

庇巴維克把不用工具的徒手生產說成直接生產方法，把利用工具的生产說為迂迴生產方法。迂迴生產方法就是在進行生產消費品之前要先進行工具的生产。迂迴生產方法效率比直接生產方法高。他說迂迴生產方法就是資本生產方式。庇巴維克，同其他資本經濟學家一樣，把生產資料作為資本。

他說迂迴生產方法帶來了時間損失。工具生產的進行意味着我們不能立即，而必需在一定時間后，才能取得消費產品。生產開始于工具的生产，而結束于消費產品的出現。二者之間有一個時間的差異，而時間的差異使我們不得不「等待」。